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7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7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导致新疆和平解放的历程	陶峙岳(1)
从撤出陕西到川北起义	裴昌会(9)
起义前的几点回忆	李 振(19)
川西起义经过	严啸虎(30)
我从鄂西溃退入川到起义的经过	陈克非(37)
云南和平解放前后的几点回忆	曾怒怀(72)
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	宋希濂(79)
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	沈 醉(87)
对《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 一文的补充	卢 汉(124)
陈光甫与上海银行	杨桂和(126)
芜湖胡开文墨店调查	芜湖市工商业联合会(146)
载洵、萨镇冰出国考察海军	林献忻(161)
福建海军沿革纪要	陈培源 陈志武 郭秀如(165)
回忆康南海史实	康同璧(173)

补充与订正

- 关于《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的补充 柳蔼人(188)
- 对《我与政学会》文中的订正 毛啸岑(189)
- 关于《韩复榘特谍队》的补充 朱子勉(189)
- 关于《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一文的
订正 阎宝航(192)
- 关于《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局》
一文的订正 刁岫生(192)
- 关于《莱芜蒋军被歼记》一稿的补充材料 庞镜塘(193)
- 关于《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 杨玉清(195)
- 关于《郑汝成之死》之订正 冯亚雄(199)
- 对《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见闻》一文的补充 董巽观(199)
- 关于《广德、泗安的防御战》的补充 雷云仙(201)
- 对《我所知道的陈诚》的一点更正 柳挺生(203)
- 对《我对许崇智了解的片断》的补充 柳清若(203)
- 《长城抗战概述》的补充材料 符昭謇(204)
- 对第十五辑两文的两点疑问 张惠通(206)
- 关于《辛亥以后二十五年间贵州军政概述》的订正
..... 陈弦秋(206)
- 对《九一八事变前后日寇和汉奸在东北的阴谋活动》
的订正 王前(207)
- 关于《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的
更正 刘叔模(207)
- 关于《改组派回忆录》的更正 何汉文(208)
- 《申报与史量才》书后 章士钊(209)

史料辨实 康同璧(212)

关于《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与消灭》的订正 谭志清(213)

附注

对《起义前的几点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四辑

对《川西起义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

对《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三十辑、第三十一辑

对《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三十辑、第三十一辑、第四十三辑

对《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

对《关于〈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的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

对《关于〈广德、泗安的防御战〉的补充》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
辑》第三十一辑

对《关于〈改组派回忆录〉的更正》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
十一辑

导致新疆和平解放的历程

陶峙岳

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国民党驻在新疆的一支近十万人的部队，在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策划率领之下，宣布即日和广州反动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通电起义。随后，新疆省政府及其所属单位，在省主席包尔汉、秘书长刘孟纯、委员屈武等率领下，通电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新疆获得和平解放。

当时起义的部队，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序列的整编四十二师所辖一二八、六十五、骑八、骑九四个整编旅，整编七十八师所辖一七六、一七八、一七九三个整编旅，整编骑兵一师所辖一、二两个整编旅，包括驻在新疆的联勤总部系统的物资供应局和空军地勤人员。

起义部队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及有关方面申宥通电：“我驻新疆将士三四年米，秉承张文白将军之贤明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执行保卫国家、爱护人民之任务，兢业从事，始终如一。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新省远在边陲，各族人士无不殷切期望遵循张将军之一贯政治主张，确保地方之安定。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正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成之中华人民共和

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切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九月二十八日给起义将士复电：“你们在九月二十五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新新疆而奋斗。”

彭副总司令给起义将士复电：“将军等率领部队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民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

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斗争，起义终于实现了。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在报纸公布之后，全疆各族人民真是无比兴奋。

二

新疆起义是由渐变到突变，经过了曲折崎岖的历程的。追溯源流，有它的前因后果。

早在一九四三年，盛世才在新疆政治投机失败，国民党的势力伸入新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压迫剥削，于一九四四年激起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民族人民武装革命，一九四五年九月进逼玛纳斯河对岸，形势十分紧张。当时张治中将军奉派飞新，通过与有关方面联系，认为新疆问题只有遵循和平途径来解决。经过重

重的努力，通过曲折的和谈，于一九四六年春夏间与伊、塔、阿三区代表签订了和平解决条款。接着成立了有各族人士参加的民族联合政府。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和增进中苏亲善的外交政策。同时，成立了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我曾一度调来主持其事，不久即由宋希濂接任。由于以上各项措施，对内消弭了战争，对外得到了苏联帮助，在相当时期内出现了相对的安定局面。这就对新疆后来的和平解放发生了深远影响。

一九四七年夏，由于一系列事件导致了民主联合政府的分裂，伊、塔、阿三区人士撤回伊犁。新疆局面一时陷于僵持状态。张将军深深感到：如此下去，新疆仍有流血危险，认为有调整新疆军政负责人而首先是军事负责人的必要。因此，我于一九四八年秋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再次兼任了新疆警备总司令。当我将去新就职，张在兰州私邸，出示他迭次建议蒋介石力主国内和平的一些函件和谈话记录，并谈到一些今后的安排，因而对于新疆将来出路问题，已是“心照不宣”，有了共同的默契。

到一九四八年底，东北国民党部队全部被歼。天津相继解放。北平正在酝酿和平，国内形势迅速发展。在张将军考虑新疆问题中，已认为必须进一步在亲苏原则下，保持和平局面，巩固民主团结，设法恢复和伊、塔、阿三区的合作，准备过渡到“和平交代”。就在一九四八年底按照预定计划改组了新疆省政府，把大土耳其主义者——新疆省政府主席麦斯武德等撤换，以包尔汉任主席，借谋三区关系的改善与新疆和平局面的确保。

新疆政治的关系正在调整，军事的压力乃相继袭来。关内的顽固派垂涎新疆的几万军队，企图把它拿去当炮灰。

一九四九年二月，曾接李宗仁电报，新疆驻军除留一旅担任防务外，余悉调进关，参加内战。马步芳则要把骑一师调回青海，宋希濂也要把军官训练班全部及其武器装备调进关内。这些部队，派系复杂，究竟听调不听调，非我一己之见所能决定。为了统一认识，就以整编部队名义，召集师旅长会议。结果是意见分歧，极不一致，未

作具体决定。且看形势发展，由我最后作出安排。于是采取了拖延办法。感于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开拔计划报得大，行动经费要得多，就以此作为应付手段。自己则多方借口，坚持不去南京、广州。拒绝部队调动，确是新疆局面尔后发展的关键所在。一拖再拖，时间就是出路。但这也是在新疆特殊情势下，方能出此一着。

通过以上一系列安排，新疆局势可以拖下去，但最后如何动员部队起义，则有待时机的成熟了。

三

西安解放，西北局面改观，时机就一天天迫切起来了。约在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起义开始酝酿。首先是刘孟纯（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省府秘书长）、陶晋初（总司令部参谋长）、屈武（省府委员兼迪化——现乌鲁木齐市长）、刘泽荣（驻新外交特派员）、梁客博（总部政工处长）等各向有关方面联系、交谈、分析和反映。当时机未到绝对成熟，防止万一有失，我不能公开表示什么态度和流露任何感情，但认为总司令部领导人的意见必须一致，南北疆部队的行动必须一致。为此，我在八月十五日左右，偕物资供应局长郝家骏、政工处长梁客博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约了住在南疆喀什的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在焉耆见面。那次密谈是没有第三者参加的。赵本极不愿部队内调，对于起义部署，深表赞同，南疆就由他负责。东疆毗连甘肃，酒泉是其门户，而河西走廊正是兰州的退路。赖有彭铭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曾震五（八补给区司令）两人在兰州暗通声气，不仅曾与新疆互相呼应，而且促使酒泉和平解放，确保玉门油矿安全，彭、曾尽到最大努力。

当马步芳接任西北军政长官，驻在新疆部队之最听指使者为其嫡系整编骑一师师长马呈祥。其他如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所属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虽为胡宗南系，而罗与马私人亲善，勾结甚密，叶则俯仰其间。他们有一共同意识，则为反共。当兰州战事

日益紧迫之际，驻新疆部队内调问题又形紧张。以马呈祥为中心，罗恕人实为主谋，每以内调为请，实则不愿率部起义，态度极为明显。考虑到部队将领情况如此复杂，如处置失当，一旦决裂，后果何堪设想。于是就以不能内调为题，经与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从事恳谈。首先从新疆本身特点，根据当时全国局势，新疆怎么办谈起，天天谈，夜夜谈，谈的方面很多。无非是希望他们放弃内调打算，从而不致阻挠准备起义的各项安排，到必要时，可设法满足其个人行动的物质愿望。对这些人说，要他们一旦在政治上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是不容易的，只有从许多利害方面逐渐说服他们。

兰州情况益紧，解放就在目前。时机已临到最后阶段，我不能不表示态度和决心，只有打开窗户说亮话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应干涉他人自由。但必须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有人不赞同起义，也就是不需要和平，那么，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争。谈到战争，必须在作战上能操胜算，后勤上有把握，才能应战。我们新疆的军队虽号称十万，但只能应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何况从军事上看，兰州、西宁相继不守，外援断绝，退路不通，运输困难。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能不能作战呢？再从根本上说，新疆的问题，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民族的关系，决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基本政策上，一切都需要运用和平方式，也就是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的。否则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自己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我们不争取主动，求得和平解放，将使十万官兵，盲目牺牲，地方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引起民族仇杀，都是必然的结果。如果坚持战争，放弃和平，一定会弄得既不能战、又不配谈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又何苦乃尔呢？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请大家选择吧！”这一席话，叶、马、罗等亦未表示反对。更从罗恕人淌下眼泪来看，似乎有动于衷。但他们思想感情，还是处于摇摆、混乱、矛盾的状态。

事态的发展，总是有起伏的。就在经过多次恳谈之后，一日深夜，我已就寝，叶成急来叩门。说：“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

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除君侧’，决定今晚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我提议应先告诉你，他们同意，故来相告。他们限我半个钟头以内回去。”我想叶之来告，其中还有几分感情作用。因留叶，电话约罗与马来谈，语极恳切，他们果即来。相见就一言直入：“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样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于你们有甚便宜？”当时，他们相顾无言，只见罗恕人淌下泪来。久之，嗫嚅而言：“我们内心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屈……”听罗之言，可以想见他们的矛盾苦恼，大都是基因于为个人打算，应即因势而利导之。我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基于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让我以冷静头脑为你们考虑问题，因应恰当，何用遇到困难而只是长吁短叹，甚至与你们相对而泣呢？目前整个局势，你们知道很清楚，应不再设想像部队内调那样无济于事的烦恼问题了。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也好，望再细思之。我要把一颗赤裸裸的心摆在你们面前，我决不离开新疆，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责任，尽到责任，虽死不辞。”话头很长，尽情倾吐，因而他们也就平静下来。一场风波，总算平安过去。东方快发白了，始各散去。在此险恶关头，脸皮幸未撕破，留有余地，大事就好办了。

第二天，我单身匹马地闯进老满城骑一师师部，他们正在开会，见我突然而来，神情颇为不安。但看不到一个随从，表示对他们是相信的，他们也就释然。我乘机作了进一步解说，比昨晚说得更深些。他们甚至连推想到我日后会如何行动都说出来了。不过他们对我心事的估计错误，纯系从个人着想出发的。立场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无足为怪。经过这次长谈，似很投机，他们最后露出笑容，对我意见似已首肯。后来，通过各方面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接触解决，尽可能满足其物质愿望，复由刘汉东（迪化警察局长，和罗恕人等结交深）加以劝说，事机已见好转。最紧要者，在解放军迅

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下，西宁继兰州之后急速获得解放，马家巢穴，破灭无遗，马呈祥已无留恋余地。且得到消息，他在青海家属已安全逃到广州。另方面，马步芳最后逃往香港时，还携走骑一师应得军饷银元五万元（例由青海拨付），也使马呈祥极为不满，认为临难不相顾，情谊何在？在此内外影响之下，于是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明白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续，许其循南疆去印度。满天烟雾，至此始稍露曙光，就是大局从此可以暂告稳定，容许另作安排。但事后也有人提出指责，谓不应让反革命逃走的。不错，从某种意义来说，应有此议。但是事实也应顾到反革命是不会甘心自己灭亡的，总想来作最后挣扎。蒋介石、胡宗南知道新疆情形，一面来电骂我“投降共匪”，一面暗中分别勾结部队将领，以遂私图。蒋胡之流，惯耍这样流氓手段，对驻新部队经费从六月份起分文不发，而以开拔费名义汇来百万元（通过兰州长官公署，马步芳又扣去二十万元，所余恰够维持生活三个月），其险毒无耻，令人愤恨。直到叶成、罗恕人、马呈祥整装待发之前夕（九月廿三日），胡宗南还有电分致叶、罗、马三人，要他们把队伍带到南疆，许以空投接济。他们最后集议，卒以“大势已去，不能有为”而未反前议，这是叶成当面告诉我的。依据以上事实来看部队动向，是极为微妙的，要罗恕人等赞同起义，势不可能。如果坚持不让他们循着适当的途径离开，一旦横生枝节，事情也很不好办。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偕其家属于九月二十四日离迪南行，新疆部队的起义通电就在二十五日发出了。以后他们经过阿克苏时，还有人逼令叶成回迪，幸未酿成变故，新疆终于获得和平解放了。

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大会正在北京集会，新中国即将诞生，对于新疆能否导致和平，当为各方面——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所殷切关注。张治中将军奉毛主席指示于九月十日由北京来电，晓以大义，嘱即行动，并对今后部队安排作了详细指示，其关切之情，尤为备至。我们于十六日收到此电，振奋之余，更难忘起着促进作用。一年以来，在新疆局势动荡中，对有关军事、政治、外交

各方面的策动、筹谋、协调、统一，刘孟纯、陶晋初、屈武、刘泽荣以及其他许多同志突破万难，作出了很大贡献。

四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新秩序亟待建立。经此一大改变，除极个别地区小有骚动，总的来说，全疆是安定正常的。他们只想今后如何巩固地方秩序的安定，进行部队的彻底改造，能为建设新新疆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没有要求，一切听党的话。首先是希望正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能够提早进到新疆。为此，我偕郝家骏于十月六日到达酒泉，曾震五、彭铭鼎已先在此，我们会见了彭副总司令和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政委王恩茂将军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将领。对于起义部队和地方现实状况作了详尽的汇报，也接受了亲切的指示。在王震将军亲自主持下，商定了起义部队的改编方案。这一改编方案，是依据现有人员武器实际数目，按照解放军统一编制订下来的，一切应有待遇，与解放军毫无差异。到一九四九年底，在上级的领导和解放军兄弟部队的帮助下改编完毕，从此归入到人民军队行列，废除了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就这样开始新生了。有关解放军由酒泉向西进军的运输问题，也依照王震将军的规划安排，由原驻新后勤机关就现有车辆、汽油、器材等尽可能提出供应，部分的有便于解放军输送，赶快驰往全疆各地，这对后来新疆局势的发展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解放军先头部队战车第五团于十月间到达新疆首府，其余部队也随后分别进抵天山南北和昆仑山麓。各族人民见到自己的军队，欢迎之热烈，真是盛况空前，载歌载舞，夹道欢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之声响彻云霄，亦可见其期待之殷切。由于解放军的迅速到达，革命秩序建立起来了，于是新社会的建设也就从此开始了。

从撤出陕西到川北起义

裴昌会

一 两条道路的抉择

一九四七年十月底，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已经十个多月了。在这段期间内，胡宗南的部队屡吃败仗，折兵损将，疲敝不堪，遂决定留整编十七师困守延安、甘泉城外，其他部队陆续抽回休整。延安指挥所撤销，我也被调回，又接替了陶峙岳的潼关指挥所主任的职务（陶调新疆）。一九四八年二月，豫西洛阳二〇六师被围告急，胡叫我率队东进支援。当时胡宗南的部队概略位置是：在豫西——整一师在渑池、新安，整三十六师和骑兵第二旅在洛宁、宜阳，整六十五师在嵩县西北地区，整三十师（欠三十旅）在卢氏、洛宁间地区；在关中——整二十九军之二十七师、九十师主力在宜君，其中一个旅在洛川，整七十六师之二十四旅在宜川，整五十七师在麟游、旧永寿；在陕北晋南——整十七师仍困守原地，整三十旅在临汾，警备旅在运城，其余部队后调陕南、川西整补。就上述军队态势说，把能机动的力量分离东西使用，很不利。二月下旬，宜川二十四旅被围攻很急，整二十九军之二十七和九十两师主力前往应援。三月初，这些部队都被解放军相继歼灭。胡宗南吃了这次大败仗后，关中空虚，他的老巢西安危急，不得不把二〇六师丢在洛阳，听其被围消灭，把豫西部队星夜撤回潼关以西，维持残局，并把撤回的部队编成第五兵团，叫我兼任这个兵团的司令官。这时，胡宗南的机动部队仅有这个兵团的力量，应付关中方面作战显已吃力，从此

只能在渭河以北澄城、蒲城、铜川等地区辗转招架，已无还手之力了。

一九四九年春，胡宗南为了暂保西安的安全，后退在泾水河南岸布防，并在三原配备前进阵地。这一带阵地在五月中旬被解放军突击，陷于瓦解，他不得已撤离西安，退踞凤翔、宝鸡以及渭河南之五丈原一带，企图凭借有利地形，节约兵力，争取有一个喘息时间，整补部队，并策划建立川陕甘边区根据地，再作最后挣扎。他的作战方针是：第一线部队保持机动，避免决战，采取逐次抵抗手段，争取时间，消耗敌人，待机转移攻势（这是老一套的公式用语）。胡宗南要这一套鬼把戏，已早为他的左右亲信所透露，实际上他的如意算盘是要入川西退，假道印度，逃亡台湾。胡宗南在宝鸡住了两天，首先带着他的看家本钱——第一军（整一师，这时各整编师都恢复了军的旧制）退踞汉中，留我在宝鸡指挥三十八军、五十七军的一个师、六十五军和九十军，执行持久抵抗的任务。这时秦川产粮区既已放弃，小麦尚未成熟收割，部队猬集山区，粮草补给倍感困难。尤其蒋帮集团的政治欺骗完全破产，经济崩溃，虽然每月照例发给官兵的薪饷，但金圆券早已成了废纸，市场拒用。官兵拿到金圆券买不到东西，怨声四起。因而军队所到之处，商店闭市，群众逃避，军纪愈加败坏，更加加重了人民的灾难。面对这种情况，清夜苦思，不能不引起良心的自谴。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桩使我两头受气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甘宁青的马家军，因为胡宗南逃窜凤翔、宝鸡和陕南后，陇东和陕甘公路完全暴露，马家的地盘立即受到威胁。为了巩固他们的地盘，由马鸿逵出面电蒋介石准令胡宗南部协同马家军恢复西安。这桩事既打乱了胡的原定计划，而且胡宗南估计到自己的现有力量，即便恢复了西安，也难确保，如果自己付出一份牺牲代价，恢复了西安，再拱手让马家攫去，更非甘心情愿，只是蒋介石的命令不得不应付，而自己的面子也要勉强支撑一下，他们几经磋商，总算达成了协议。于是，马家军沿陕甘公路倾巢东进，直扑咸阳；甘肃省主席郭寄峤也把由该省保安团队新拼凑起来的

一一九军开来，归入五兵团序列，遂以一一九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和九十军，分由渭河南北向武功、麟游之线推进。两个系统的部队各自指挥，第一线部队也互不联系，甚至马家军不允许去联络的官兵通过他的警戒线。这样，怎能说得上协同作战？迨至马家军在咸阳城廓受到挫败，宝鸡东进部队也在武功、麟游迤西之线遭得阻击不能前进。马鸿逵因为他们的骑兵攻坚伤亡惨重，经常来电话，情急地诘问我：“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躲在后面不进呢？”更奇怪地说：“你们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咸阳城廓所构筑的工事不撤除，硬叫我们来碰钉子。”这些蛮不讲理的话，实在听够了。可是，胡宗南又在电话中说，马家素来狡猾，不要上他们的当，嫌我过于迁就。两头受气，令人愤懑。这些家伙互相猜忌由来已久，他们在利害关头上，总是矛盾重重，无法解决的。

我为了避免他们在电话上的无聊纠缠，有时到住在宝鸡的我的老同事李希三处攀谈。他在一九二九年即到四十七师搞军需业务，后来我任四十七师长和第九军军长的时候，他都任军需处处长。他对蒋介石卖国、反共、打内战极表愤慨，曾于一九四〇年在西安以“与八路军有联系”的罪名，为特务劫去，失踪了半月多，经我几次向胡宗南交涉，才被送回。经过这次波折，相互间的情谊更加密切了。我在极度困惑中，得同知己的故旧畅抒心怀，分外慰藉。我们追溯过去为反动派做帮凶，搞得国是日非，民不聊生，到头来仍被他们猜忌歧视；认为在目前，反动政权即将垮台，绝不能再走错路，和他们同归于尽。他说革命为的是国家复兴，民族的繁荣幸福，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人，应该投到真正的革命阵营中去。中国共产党是允许和鼓励人们弃暗投明、立功自赎的。他并说，如果我相信的话，他愿意设法帮助。这些话是经过几次谈心说到的，现实的困损，不能不引起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认识到：要么顽固地跟反动派走，只落得一个逃亡毁灭的结局；要么投靠党和人民，争取主动赎罪，走向新生。前者既非本愿，是死路一条走不得，我决心走后者这条光明的道路。于是，我郑重地托付李希三设法进行，并约定如有